

“土著花草”的生长之道



德国法律规定,城市绿地建设必须优先使用本土物种。视觉中国供图

新视野

认识上海的活血丹吗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城市建设与生态技术学部教授 贺坤

在科普时,为了更加生动,我们往往用“土著植物”比喻“乡土适生植物”,而后者是将“乡土植物”和“适生植物”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统称。简单来说,它指的是那些原产于本地区,或者虽然原产于外地但经过长期驯化,已经完全适应当地气候、土壤环境,能够健康生长并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的植物。上海大部分陆地是近两千年以来由长江携带的泥沙堆积而成的,相比于拥有古老地质历史的山区,这片土地形成时间太短,植物群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里进行漫长的演化和演替。不过,上海作为“适生植物”的乐土,引进了大量适应华东气候的外来植物(如法国梧桐、水杉等),它们

在已经很好地融入了上海。在推进“土著植物”应用的过程中,诸多认知和实践误区亟待规避。一是规避“唯土著论”误区,认为所有土著植物都适合城市绿化,忽视植物生态习性,生长杂乱、景观性差,或存在病虫害隐患,盲目栽种会影响城市绿化品质。二是规避“重生态、轻景观”误区。应将土著植物应用与绿地景观设计结合,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乔灌木搭配,打造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价值的绿化景观。以上海为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仍有丰富的土著植物资源尚未被充分挖掘,许多兼具生态价值与景观价值的土著植物,值得

被更多人看见。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编制的乡土植物名录之外,还有一些“冷门土著”,比如上海毛茛、老鸦瓣、紫花地丁、紫萼、委陵菜、活血丹等,都可以在城市绿化中栽培展示。以活血丹为例,它是一种优良的土著地被植物,叶片呈心形或肾形,开淡蓝紫色带斑点的小花,景观别致,且耐阴性强,适合在林下空间、公园树荫下、居民区绿地的荫蔽处栽种。它既能覆盖地面、减少杂草生长,又能为中华蜜蜂等传粉昆虫提供栖息环境。目前因缺乏商品化生产,尚未广泛应用,上海已将其纳入乡土草本植物扩繁计划,未来有望批量进入城市绿地。



上月,上海绿化市容部门宣布,将精选一批乡土适生树种和地产草种,大规模应用到绿地和马路,比例不低于80%。

近年来,全球城市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绿化理念变革:摒弃“择美而种”的对外来物种的偏好,转向以乡土适生植物为核心的生态化、本土化、低维护绿化策略。

本报记者 彭德倩

历经数万年演化,与本地气候、土壤、生物协同共生的“土著花草”重新成为城市绿地的主角,有何生长之道?

全球多地基于自身地理、气候、文化与城市发展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

从“景观装饰”到“生态基石”

过去数十年,全球城市绿化深受“城市美化运动”影响,追求视觉上的整齐划一与异域风情,引入外来名贵花卉、常绿灌木与草坪。这种“择美而种”的模式虽短期内营造出精致景观,却埋下诸多隐患:外来物种适应性差,需高强度灌溉、施肥与病虫害防治,养护成本高昂;单一化种植导致生态脆弱,难以抵御极端天气;外来物种可能入侵本地生态,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干城一面的绿化风格,也让城市丧失了独特的地域风貌。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危机凸显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城市规划者与生态学家逐渐达成共识:乡土适生植物是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长期适应本地气候、降水、土壤与病虫害,具备极强的抗逆性与自我维持能力,能大幅降低养护成本;其与本地昆虫、鸟类、微生物形成稳定的协同关系,是构建城市生物多样性网络的核心。

同时,乡土植物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忆,能塑造独特的城市景观,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一理念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全球各地的实践中逐步深化。欧洲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先行之地,在乡土植物应用上走在全球前列,形成了以政策法规为保障、近自然修复为核心、公众参与为支撑的成熟体系。

德国《自然保护及环境维护法》规定,城市绿地建设必须优先使用本

土物种,且乡土植物占比不得低于70%,从法律层面为“土著花草”保驾护航。

慕尼黑市郊的“城市生态绿洲”项目是典型案例。该项目占地2.5公顷,原为工业闲置用地,设计遵循“最小干预、最大生态”原则,保留60%原生植被,采用“近自然林业”理论构建复合型绿地系统。

乔木层以德国原生的橡树、山毛榉、松树按3:2:1比例混植,形成稳定的顶极群落;灌木层选用欧洲荚蒾、榛子等乡土灌木,在林缘形成2—3米宽的过渡带,为小型哺乳动物提供栖息地;草本层采用自维持的乡土草甸,无须频繁修剪与灌溉。项目建成后,雨水径流削减70%,养护成本仅为传统绿化的1/3,同时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节点。

法国在乡土植物应用上兼顾生态功能与城市美学,尤其擅长将本土植物融入建筑与城市家具,打造“三维生态空间”。巴黎一家医院的大楼上,390平方米的绿墙全部选用法兰西岛原生抗性物种,包括适应石质环境的草本灌木与旧墙常见幼虫寄主植物,设计师根据墙面方位与湿度差异精准布局,让植物通过预制面板自由扎根、自然演替。这些本土植物无须人工干预即可完成生长循环,墙面从单纯的建筑表皮转变为承载昆虫、鸟类的“垂直生态廊道”。

可以适当牺牲一些观赏性和秩序感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仅38%的居民认为“自然生长的草地”美观,多数人仍将“无杂草”等同于“高品质绿化”。

如今在澳大利亚岸边常见的海岸斑克木,曾被认为是普通灌木,近年来,在乡土植物应用上走在全球前列,形成了以政策法规为保障、近自然修复为核心、公众参与为支撑的成熟体系。

德国《自然保护及环境维护法》规定,城市绿地建设必须优先使用本

土物种,且乡土植物占比不得低于70%,从法律层面为“土著花草”保驾护航。

加拿大针对传统人工草坪高耗水、高维护成本的弊端,发起了“让野草回归城市”的运动,倡导用本土野生草本植物取代人工草坪。植物园专家指出,传统人工草坪依赖化肥、杀虫剂与除草剂,不仅污染土壤与水源,还几乎不提供生态功能;而本土野草适应性强,无须高强度人工养护,能吸引鸟类、蝶类与本土传粉昆虫,形成更健康的城市生态景观。

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率先推广“野草地”绿化模式,新建居民区保留原有野草地,不再统一铺设人工草坪;城市公园与道路绿化带逐步替换为本土草本植物群落。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生机勃勃的本土植物景观,大幅降低绿地耗水量与养护成本,同时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载体。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当地原主场馆区留下大片硬化地面。项目团队没有选择速生的外来草皮,而是启动了“植物群落单元”重建计划。在湿地边缘,他们用海岸斑克木与篮子草构建“海陆过渡带”;前者深红色的花序吸引吸蜜鸟,后者细密的根系像网一样锁住泥沙。

规划建设团队像拼乐高一样组合植物——先种固氮的金合欢改善土壤,再引入耐阴的蕨类,最后点缀开花灌木。为保留遗传多样性,团队坚持用种子繁殖而非扦插,甚至专门开辟“本土植物苗圃”收集野生种子。如今的奥林匹克公园,每年吸引127种鸟类栖息,包括罕见的黑天鹅在此筑巢。原本需要每周灌溉的草坪,现在靠雨水就能维持。

美国在乡土植物应用上注重“超本地化”与气候适应性,尤其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实践极具借鉴意义。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卢里花园以北美草原本土植物为核心,打造了城市中的“四季荒野花毯”。花园共种植205种植物,其中约半数美国中西部本土多年生草本与灌木,包括大须芒草、柳枝稷、紫锥花、蓝花靛等。

如今在澳大利亚岸边常见的海岸斑克木,曾被认为是普通灌木,近年来,在乡土植物应用上走在全球前列,形成了以政策法规为保障、近自然修复为核心、公众参与为支撑的成熟体系。

德国《自然保护及环境维护法》规定,城市绿地建设必须优先使用本

沙漠植物为核心的“城市绿洲”。公园设计灵感源于当地棕榈峡谷的加利福尼亚扇形棕榈树林与塔查兹峡谷地貌,大量种植本土耐旱植物,如加州扇形棕榈、沙漠铁木、龙舌兰、桶形仙人掌、加州罂粟等,结合就地取材的石材与互动水景,在极端炎热的沙漠中营造出舒适的公共空间。这些本土植物高度适应当地干旱气候,配合节水灌溉系统,用水量显著低于传统草坪绿地,同时为沙漠昆虫、鸟类提供栖息地,实现了生态与景观的双赢。

让城市在发展中留住“乡愁”

全球城市的乡土植物复兴实践,源自“回归自然、尊重本土”的理念认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塑造独特城市风貌的同时,也让城市在发展中留住“乡愁”。

新西兰奥克兰在乡土植物种植方面颇有成效。当地积极建设雨水花园,大量种植当地水生和湿生乡土植物。在植物选择上,会挑选对当地环境适应性强的品种,如能耐受一定盐碱度的海滨植物,以及具有良好净化能力的湿地植物。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地还鼓励社区参与雨水花园建设,举办植物种植活动,提高市民对乡土植物保护的认识。

英国同样注重将乡土植物绿化与社区教育、公众参与相结合,打造兼具生态与社会价值的绿地空间。多地在社区建设“乡土植物生态园”,与传统社区花园不同,这些生态园模拟自然群落结构,混合种植乡土乔木、灌木与草本,并设置物种习性说明牌,向居民普及本土生态知识。

伦敦北部的海格特社区生态园是代表性项目。园内种植了超过200种英国本土植物,园中高大的英国栎到低矮的毛地黄,形成层次丰富的自然景观。生态园定期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科普活动,带领居民识别本土植物、观察昆虫与鸟类,让居民在参与中建立对本土生态的认知与保护意识。

越洋漫笔

再访印尼

“堵车”背后的困局

■谢一青

飞机在日惹的夜幕中降落。舱门打开的刹那,空气像一整块被赤道浸透的绒布,带着沉甸甸的温度与湿度,瞬间裹挟而来。车窗外,摩托车的河流正闪烁着汇入灯光摇曳的双车道“高速公路”,凤凰木与鸡蛋花的暗影在湿热的风中摇曳,掠过低矮民居的轮廓……

2016年,我为一张《国家地理》的清单而来印尼——一只那“人生必见”的婆罗浮屠日出。站在日惹潮湿的晨光里,我所感受到的震撼远不止于风景。那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目击:传统与现代、象征与实权、宗教与世俗,并非必然取代,而可以复杂地编织在一起,形成这个万岛之国独一无二的社会肌理。

2025年8月,我再次降落在印尼。这次,是巴厘岛。最初的熟悉感很快被现实消磨。前往乌鲁瓦图神庙的20公里路程,车流却蠕动近两小时。导游解释,岛上道路多为为往昔乡间生活修建的窄路,如今却要容纳数倍增长的旅游车、自驾车与摩托,拥堵已成常态。此后的几天,相当一部分时光被囚禁在路上。2016年那种在日惹随心探索的轻松节奏,在这里已难寻觅。

2016年在日惹,导游曾认真地指着我们正行驶其上的双车道说:“这就是我们的高速公路。”我当时半开玩笑地回应“这或许还称不上”,并觉得加大基建投资对印尼来说是促进增长和提升福利的双赢之举。那时的道路状况,尚可理解为发展中国家早期旅游业的常态。

然而,近十年后,当我在巴厘岛面对几乎如出一辙,甚至因车流暴增而严重恶化的拥堵时,我感到已不是理解,而是震惊。一个旅游业已成为生命线的地区,却在最关键的交通瓶颈上长期停滞。这绝非简单的“发展滞后”,其背后或许是更深刻的系统性困局。

道路建设的核心挑战,早已超越了“资金”这一表层问题,直指一个本质的困境:社会缺乏进行大规模、高效率协调的制度能力与共识基础。

其结构性约束体现在三个相互纠缠的层面。

首先,是权力碎片化。高度的地方分权与盘根错节的央地关系,意味着任何一个基建项目都面临无数的“否决点”,统一的基建蓝图难以跨越行政与利益边界。

其次,是诉求分层化。不同岛屿、族群之间对“发展”的理解与优

先级截然不同。一条旨在连接景区、促进旅游的公路,可能因触及原住民的土地、宗教场地或传统生计模式,而遭遇根植于文化认同的强烈抵制。

最后,是规则二元化。强大的传统社区规范和习惯法,与成文的现代国家法律体系并存。项目推进不仅要在法律上合规,更必须在地方传统权威与社区中获得“社会性许可”,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与漫长的协商。

因此,问题的本质是复杂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其深层结构张力在物理空间上的直接体现。

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印尼多个岛屿的道路困局清晰地揭示了一个发展悖论:制度环境所内生的极高协商成本,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隐形天花板”,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一同锁定在低水平的均衡之中。

对于旅游业命脉地区,这种低水平均衡最终会转化为残酷的增长上限。初期的“流量红利”终将被极致的拥堵所反噬,目的地吸引力不升反降。交通瓶颈锁死了产业升级的路径——高端旅游、会展经济等对效率敏感的业态,难以在基础设施脆弱的土壤中生长。

问题核心在于制度供给的短缺。资金与技术可以引进,但若无法构建一套能够显著降低协商成本、促成集体行动的有效规则与权威,那么,物理空间与经济发展空间将被一同限制在由自身治理结构设定的天花板之下。

车流停滞在巴厘岛的窄道上,窗外的景象如慢放的影片:围墙内精美的家庙、院落中枝叶舒展的菩提树,路边悠然行走的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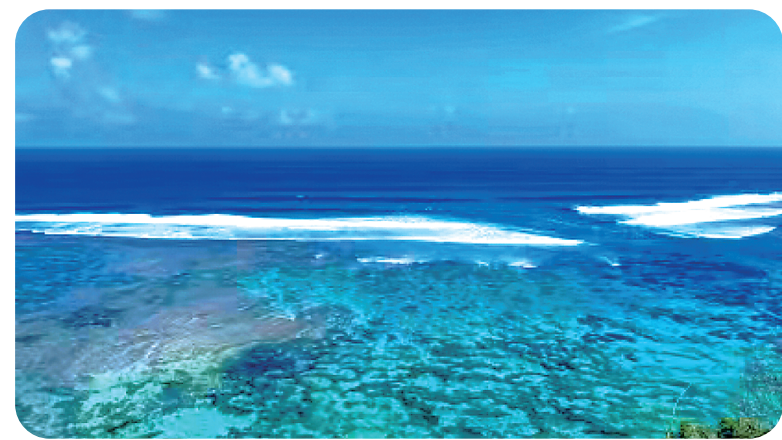
在这近乎凝滞的车流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浮现出来:当“发展”的手,紧握着文化、信仰与社群认同这些无法被简单计价的方向盘时,道路,究竟该通往何方?

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找到一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保护文化肌理与满足现代流动性需求之间,创造出创新的平衡。

最终,印尼需要的或许不是一条单纯追求速度的“高速公路”,而是一张能够连接不同价值体系、允许不同时间节奏共存的“多元路网”。

这条路网的终点,不是单一的经济繁荣,而是一个文明在面对现代性浪潮时,既能保持自我,又能从容向前,那种坚韧而复杂的生命力。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尼库塔的海。作者供图

搜城记

马赛

欧洲烹饪选拔赛 丹麦队三度夺冠

日前在法国马赛举行的2026年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欧洲区比赛中,丹麦队连续第三年夺冠。挪威和意大利分列第二、三名,法国队则遗憾止步第五名。这项国际选拔赛首次在马赛举办,汇聚了20支欧洲队伍,争夺世界总决赛的入场券。在比赛中,丹麦选手凭借其精湛的烹饪技艺和菜肴的和谐搭配脱颖而出。

组委会还颁发了多项特别奖,其中瑞典因“拼盘”主题获奖,芬兰则因“地中海风味”获奖,这充分彰显了参赛作品在烹

饪手法上的多样性。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由保罗·博古斯于1987年创立,被誉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烹饪赛事之一,是国际美食卓越水平的展示平台。欧洲赛区选拔赛至关重要的一站。明年1月,全球总决赛将在法国里昂举行。此外,非洲赛区的选拔赛将于5月6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拉开帷幕,美洲赛区的选拔赛将于7月26日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中国和亚太地区也将分别举行选拔赛。(摘编自:欧洲时报网)